



访日随感

张英伯

记得我第一次对日本有印象是在五十年代末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说日本的长崎和广岛在二战快结束时被美国用原子弹轰炸过，很多人死了，活着的患上了严重的疾病，让我们就这件事情给那里的小朋友写一封信。我写了“你们虽然生活在遥远的日本，但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老师删掉了前一句话，改成“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我们的心是连在一

起的。”作文本发回来，我盯着“一衣带水”四个字看了半天，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老师说中国和日本的海域离得很近，只有一条衣带那样宽的水。几十年后我从北京飞往东京进行学术访问，才知道两国之间的航程不比从北京飞到乌鲁木齐更远。

我对日本人产生具体的印象是八十年代在德国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我们这个领域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日本

教授，在筑波大学任教，同领域的专家都很尊敬他。有一次他来德国访问，我邀请他和两位欧美教授共进晚餐。席间谈到中国文化，他很兴奋，说他们小时候上学都必须学汉字，还要写毛笔字，背古诗。说着说着就背了起来，头摇晃着，像唱歌一样带有韵律。虽然发音含混，但是依稀能够分辨出是李白的“思乡”。当着欧美教授的面，我得意极了，中国的文化影响深远啊，

日本筑波大学



不服不行啊。他背完诗又写了一些中国字，还别说，写得真漂亮，一看就有毛笔字的功底。不料他突然话锋一转，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日本那么小，那么可怜，没有一点资源，到中国去借一点资源，中国为什么要打我们呢？记得当时我的脑袋“轰”的一声懵过去了，日本把中国打成那样，杀了那么多老百姓，抢走了那么多宝贵的资源，这叫借一点资源？这叫中国打日本？还没等我回过神来进行反驳，他们告辞了。直到将他们送出大门，我都懵懵的，在一衣带水的邻邦面前产生了强烈的屈辱感。心想你们不就是经济比中国发达吗？数学比中国做得好吗？那也不能把侵略说成有理吧。

又过了些日子，我和日本的山形

邦夫一起乘火车到其他城市开会，山形邦夫是这位教授的学生，正在德国合作研究。我忍不住问他怎样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略中国的问题。没想到他跟老师的观点相反，明确地说日本在二战中就是侵略，应该向中国道歉。日本文部省在小学课本中歪曲二战事实，给下一代的思想造成混乱，是应该改正的。我复述了他的老师在那天晚餐上的问话，他说那一代的日本人已经被军国主义彻底洗脑了，很难转变过来，日本战后出生的一代就不会这样了。我终于长舒了一口气，心理平衡了一些。

那时早已发生了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在华沙二战死难的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谢罪的事情。德国人直面历史，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震惊了世界，令人敬佩。可是日本官方从来没有向中国和亚洲各个被他们侵略的国家正式道过歉。我暗暗思索这是不是东西方文化的一种差别？西方人经常忏悔自己的错误，东方人经常不承认错误？在中国不是也没有对文革时期的罪行进行过彻底的反思吗？可是又一想，也不对呀，西方的基督教固然主张忏悔，我们东方的孔子不是也说过要“吾日三省吾身”吗？

我对日本这个国家有了一点了解，是在九十年代去日本筑波大学访问期间。记得从成田机场下了飞机，山形邦夫教授早已等候在机场门口。坐在他的汽车里一路开过去，沿途的田地和城镇太像中国了，连店铺的商标都是用中文写的。唯一不同的是北京气候干燥，东京周边异常湿润，因此夏天的温度尽管与北京相同或略低，却依然闷热难耐。筑波位于东京近郊，是日本政府建设的科学研究基地，各种研究所遍布其中，有点像我们的科学院，又有点像美国的硅谷。筑波大学的校园是狭长的，楼房都很普通，数学系和几个理科系共用的楼是砖红色的，不远处就是学校招待所

灰黄色的楼。我因为不大能辨别方向，怕给别人找麻烦，基本上在招待所和数学系两点之间的线段上移动。筑波的教授工作十分努力，晚上十一点之后看看数学系的窗口，还有一多半亮着灯光。记得有一天我正在午睡，突然床铺摇晃起来，头顶上的灯也在摇晃，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地震，赶紧推开房门跑了出去。跑到走廊里一看，几位教授正围坐在走廊尽头的一张小圆桌旁专心地讨论问题，前台的服务员也端正地坐在柜台后面，没有人惊慌失措，也没有人准备逃出大楼。看看这种情况，我迟疑着退回房间继续午睡。后来听日本的教授说，日本经常地震，因此楼房都是防震的，地基格外深，结构格外坚固，造价有时是美国同等楼房的十倍。天哪，竟然有不怕地震的房子，因为地震很难预报，所以日本人把劲使在盖房子上了。

访问筑波之后，我又陆续去了日本几次，有时去参加学术会议，有时去合作研究。对日本有一点深层次的了解是在一次会议之后。会议的组织者之一佐藤教授陪我们在东京观光。他问我们想去哪里，我说去看看与明治维新有关的遗址。我在中学上历史课时，对明治维新印象很深，总是弄不明白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我们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忘记是什么原因，好像是其他几位教授都去过了，跟随佐藤教授去明治神宫的只有我一个人，于是我们得以深谈了一次。

明治神宫是东京的五大神社之一，坐落在代代木地区。走进神宫，环绕着神殿的参天大树令人心旷神怡。我终于有机会面对面地问一位日本人，同为东方文化，为什么他们的明治维新能够成功。没想到他一开始就不同意我的说法，他说中国和日本虽然同处东方，但是文化和政治体制差别很大，我说我们有皇帝，你们不是也有天皇吗？他说是的，但是天皇



日本的第一个菲尔茨奖得主：小平邦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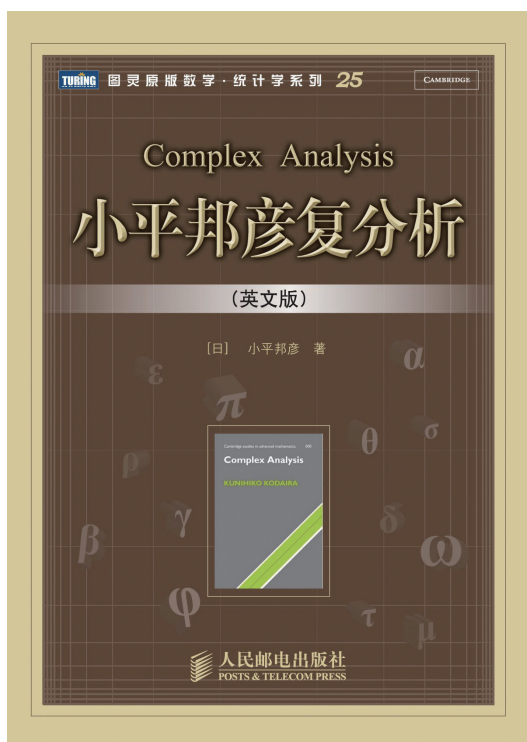
家族在日本并没有实权。天皇只是在名义上统治了日本3千年，只是日本的一个象征或者说符号。自古以来，日本并不真正统一，各地方的武士执掌实权，互相拚杀。我说像中国的春秋战国吗？他说有一点，但日本很小，每块地盘都不大，各地的武士必须启用有能力的人来协助他，否则很容易被别人消灭。而中国的皇权是实实在在的权力，两三百年轮换一次，因为皇权是绝对的，不需要有能力的人辅佐，因而就喜欢大臣逢迎拍马。我突然意识到，他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比我对日本历史的了解要深刻得多。我说你学过中国历史？知道春秋战国？还知道中国两三百年就有一次改朝换代？他说当然，中国历史对于日本学生是很重要的，因为日本从中国学习了文字、宗教、和艺术。

他告诉我明治维新的成功是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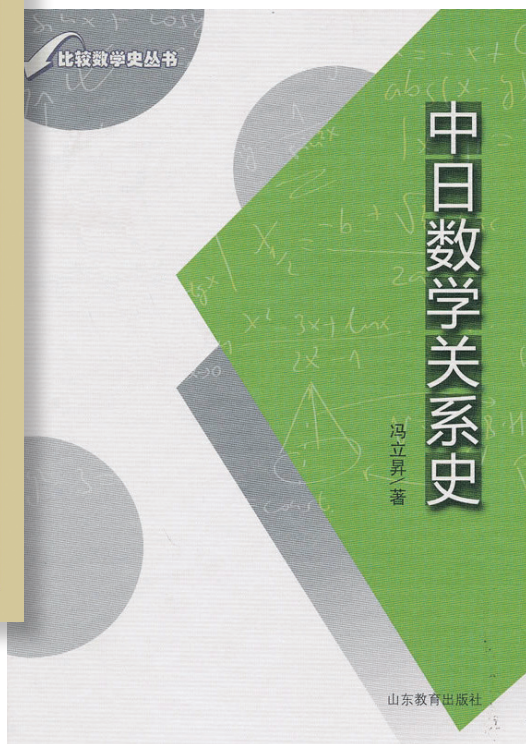
史的必然，在明治天皇开始维新之前，日本的各路武士被丰田秀吉征服，首次实现了统一。后来德川家族打败了丰田家族，掌握了日本的实权，史称幕府时代。那时候日本的很多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强大，感到日本走向富强必须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于是很多有才华的年轻人致力于辅佐明治天皇，结束幕府的统治，实行君主立宪，让日本成为一个法治国家。我说那你认为我们的戊戌变法为什么失败呢？那个年代中国也有不少有识之士看到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了，希望实行宪政了呀。他说他认为戊戌变法的失败也是必然的，因为中国有着持续了两千多年的绝对的皇权，控制到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改变起来很难。我虽然很不情愿，也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有一定道理。想想中国走向民主和法治的道路，多少人

被关被杀，多少人倒了下去，直到戊戌变法失败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在通往民主与法制的道路上艰难跋涉。明治神宫和佐藤教授的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今年暑假期间我再一次来到东京，是因为受中国数学会的委托在国际数学教育委员会担任执委，被派来参加东亚地区第五届数学教育大会，会址就在明治神宫旁边。大会开幕式之前的傍晚，组委会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招待会。走进小小的饭店，中国同事招呼我坐在他旁边，然后介绍我认识在座的各位日本教授。令我十分惊讶的是，饭局总共三桌，每桌十人左右，有两桌的教授是搞数学教育的，我们这一桌坐的竟然都是日本数学家，有研究数论的，研究几何的，研究代数几何的。其中有几位看起来年纪大了，竟然有一位是日本数学会的



小平邦彦亲自编写中学生和大学生教材。这本《复分析》是很有口碑的教科书



前任理事长。我对面的一位看起来年轻些，英语好一些，他说他是小平邦彦的学生。可惜饭局很短，跟日本老前辈交谈语言上比较困难，没有问清楚他们为什么来参加这个会议。

会议开始以后，我又遇到了小平邦彦的学生，他每天都按时出现在会场。他告诉我他也在日本数学会工作过，并被数学会派到国际数学教育委员会担任过执委。我一下子觉得遇到了知音，跟他聊了几次，仔细询问了日本数学界与数学教育界的关系。他说日本数学教育方面有三个主要的组织，现在组织会议的是人数最多的一个。他们每次开会都邀请数学家，有些数学家还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我问他日本有没有发生类似于美国前一阶段发生的数学战争？他说有一些争

论，但是不严重，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基本上能够坐下来一起讨论问题。我问他小平邦彦编写的高中课本在日本是否还有学校使用？他说前几年有些很好的学校在用，现在有的地方重新编写了。总之，日本的数学家非常关注数学教育，特别是一些知名的大数学家。给人的感觉是，日本人挺团结，经常全力以赴地共同做一件事情。

日本，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早已步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日本走向科学和民主的道路并不平坦。坂本龙马是一位明治时期的政治家，他撰写的政治纲领“船中八策”的许多条文，被原封不动地搬入明治新政府的宪法，可惜 32 岁被政敌暗杀。一个半世纪以来，他经常被日本的官方和老百姓用各种方式纪念着。

中国和日本曾经是宿敌。但是日本走上了科学与民主的道路，日本今天的许多做法，也许可供我们借鉴。



作者介绍：

张英伯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本刊编委，《数学通报》主编。